

《军事纪实》为您讲述——

兵车闯“天路”



在穿越雪域高原的新藏线上，有一支运送新兵的车队正在艰难地行进着，他们要从新疆喀什赶赴西藏阿里，穿越1070公里的“天路”，到达驻地——阿里狮泉河。前路漫漫，这支车队能否顺利到达目的地？会不会遭遇险情？雪域高原又给这些戍边官兵带来怎样难忘的记忆？

换轮胎必须“慢动作”

今年4月，位于新疆喀什地区某部的一群新兵正在做着出发前的最后准备，因为他们即将走上青藏高原，去西藏阿里地区服役。那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，号称“世界屋脊的屋脊”。每年，只有在新藏公路冰雪融化、运输线路开通时，新兵们才能乘坐汽车上山。

与此同时，汽车营正在做着前往高原的最后准备。多年以来，这些汽车兵们一直奋战在气候恶劣、路况复杂的新藏线上，而运送新兵则是今年开山后他们接到的第一项任务。

出征的日子终于到了，天还没有亮，新兵们就开始打点行装，面对即将踏上这条闻名已久的危险“天路”，新兵们显得既紧张又兴奋。随着马达的轰鸣声，汽车发动了，车队缓缓驶过219国道零公里处，这些新兵们将从这里走上高原，走进阿里。新藏公路，又称219国道，是西藏阿里地区乃至整个藏北高原与外界连接的唯一道路，全线经过的大部分地段均为“无人区”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、道路最险、环境

最恶劣的高原公路。

车队第一天的计划是从叶城赶到麻扎兵站，全程242公里，途中将翻越两座海拔近4000米的达坂。达坂是维吾尔语中“大山”的意思，这意味着战士们将要以血肉之躯，翻越两座危险重重的大山。

刚开始的行程让新兵们十分兴奋，但是谁也没有想到，车队走了还不到100公里，就遇到了爆胎的麻烦。但对刚上高原的人来说，换轮胎可不是一件普通的事，别看这里的海拔只有300多米，但空气已经稀薄得足以使人昏倒。平时训练场上生龙活虎的战士们，现在却只能放慢脚步，减小动作幅度，演起了电影里的“慢动作”，甚至换一个轮胎还要几个人轮流“作战”。幸好，换轮胎的过程有惊无险地完成了，战士们登上汽车，启动马达，车子又缓缓地上路了。

脚下是数百米深的悬崖

几个小时之后，公路延伸进了绵延不绝的喀喇昆仑山脉，这段公路大多沿山谷、河流而建，洪水、泥石流、塌方在这里都是常有的事情。

突然，不知谁喊了一声：“前方就是库地达坂了！”从地图上看，库地达坂位于喀喇昆仑山脉的西北部，海拔3900米，坡度陡、山路崎岖，是新藏公路进入喀喇昆仑山腹地的第一道关口。

此时，战士们眼前出现了一座公安边防检查站，没有办理证件的车辆是不准通行的，这也提醒着这些年轻的战士们，新藏线并不仅仅是一条普通的公路，更是一条靠近边境的国防路。

过了库地达坂，柏油路也在山脚下消失了，道路变成了十分颠簸的碎石子路。尽管已经有了思想准备，但车到半山腰，眼前的景象还是让大家感到震撼：盘山路的宽度只有不到4米，而汽车的宽度是2.5米，数百米深的悬崖让人望而生畏，任何闪失都会在瞬间造成车辆滑入山涧的危险。幸好，驾驶员都是具有多年经验的老汽车兵，他们沉着冷静地握紧方向盘，驾驶着汽车在悬崖旁艰难而缓慢地行驶着。

下午5点，官兵们的宿营地麻扎兵站终于到了，大家纷纷下车休

整、吃饭。可惜这顿晚饭，大家的食欲都不好，只觉得心脏狂跳、呼吸困难，严重的高原反应已经出现了。

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

第二天，天刚亮车队就出发了，近3个小时之后，康西瓦烈士陵园出现在战士们眼前。

康西瓦，维语的意思是“有矿的地方”，它位于喀喇昆仑山的正北方向。烈士陵园的烈士纪念碑下，安葬着上世纪60年代初为保卫边疆而牺牲的100多位烈士，它是高原军人心中的一块圣地。

平时，部队的官兵路过这里，不论职务多高，都要去看看烈士们，给他们点支烟、敬杯酒，每逢清明，烈士墓前更会摆满在高原难得一见的鲜花。如果时间紧迫，经过烈士陵园的人也会放慢车速，按声喇叭，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烈士们致敬。有时，运输车队的十几辆汽车路过康西瓦时，跟烈士们打招呼的喇叭声会在山谷中久久回荡。

2.5米宽的汽车，开过不足3米宽的路

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

1941年1月，国民党军队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“皖南事变”。事变发生后，国民党当局将被俘的新四军排以上干部700多人武装押送到上饶，并在上饶周边的周田村、石底村、李村、茅家岭等地强占民宅，经过改造用来关押被俘的新四军战士。之所以这么做，一是因为当时正值抗战，没有条件大规模修筑监房，二是因为国民党当局要粉饰自己同室操戈、破坏抗战的行为，所以不用牢狱囚禁，而对外谎称是整顿军纪，训导违抗革命、不听调遣的新四军战士。

上饶集中营茅家岭监狱，当时是集中营里的死囚牢，被称为“狱中之狱”，专门用来关押集中营当局认为顽固不化的死囚犯，看守极为严格，刑罚也极为残酷。尽管如此，当年震惊全国的茅家岭暴动就发生在这里。在禁闭室的墙壁上，至今还能看到当年新四军战士用自制的羽毛笔画的马克思、恩格斯等人的头像。虽然已时隔多年，眼前这一间间昏暗的囚室仍让我们感到阴森恐怖。

在茅家岭监狱，还流传着“十大酷刑”的说法，至今仍保存原貌的铁刺笼，让每一个前来参观的人真切触摸到了那段历史。这种铁刺笼体积很小，四周用铁刺制作而成，人站在里面，一不小心就会被铁刺划破。当年，革命志士赖少奇就是因为在这里画了一幅《高飞图》，被国民党认为是暴动的信号，把他关在铁刺笼里，三天三夜滴水未进。

现年84岁的季老也曾被囚茅家岭，被捕前他是国际新闻社的新闻干事。回忆起在集中营的日子，季老至今记忆犹新。“凡是抓到茅家岭的人都要受重刑，有的人被从鼻孔灌辣椒水，有的人被烙铁烫，有的人还被针头扎……都是很残忍的。”刑讯室是当时对被俘人员严刑



茅家岭监狱旧址。

逼供的地方，这里的每一种酷刑都让人毛骨悚然，让受刑者生不如死。这就是集中营里“训导”的真相。

长期的折磨和无边的等待，让关押在这里的新四军将士认识到，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，要么听天由命，要么奋起反抗，冲出牢笼。

一次成功的越狱行动

在宪兵看管极为严密的监狱里，对于身体状况极差、手无寸铁的新四军战士来说，想要越狱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为了实现暴动计

《走遍中国》为您讲述——

逃出上饶集中营

划，被俘的新四军将士组成了暴动委员会，李胜任军事总指挥，王传敷为暴动时的选择人。表面上，他们恪守监规，使看守的卫兵产生错觉；暗地里，所有人都在严格按照计划一步一步地进行着。

为了让大家能够增强体力，在狱中的陈子谷卖掉了自己身上最为值钱的派克钢笔和毛衣，买来黄豆分给大家。这样的行为很快引起了卫兵的警觉，王传敷告诉卫兵，买黄豆补身体是为了有力气参加受训，早日完成改造。为了确保暴动成功，他们悄悄在原地练习跑步，做深呼吸锻炼身体。在各项基本条件具备后，就是等待时机。

1942年5月25日早晨，监狱里显出平日少有的宁静。外号叫“王八”的监狱管理员王恩锡没有出现，卫兵也明显比往日减少许多。下午4点左右，为了摸清情况，王传敷假装要找管理员“王八”报告情况，让卫兵打开了囚室大门。他走到管理员办公室，不见“王八”，走到排长室也不见卫兵排长。王传敷立刻回到囚室，向暴动委员会报告了情况，委员会决定立即行动。

李维贤老人是当年暴动的积极分子，老人一生拼杀战场，回忆起集中营的日子，他仍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况。当时，与李维贤同监房的新四军战士杨灿要求去天井洗衣服，卫兵嫌麻烦，就将铁锁随手挂在门上走出了院子的大门。当看到大门被关上时，杨灿立刻把铁锁摘下，推开囚门，囚室内的人顿时冲出牢房。

按原定计划，大家分头去抢卫兵的武器。这时，被关在大门外的卫兵回过神来，慌忙砸门并开枪射击。危急之下，大家砸开了平时封死的西侧门冲了出去。

在这次越狱行动中，为了掩护大家，王传敷不幸负伤并最终牺牲。茅家岭暴动成功的消息就像一声春雷，在集中营里引起极大震动，鼓舞了广大被囚难友越狱出逃的信心。然而，这也让国民党高层极为震怒，下死命令严防再有人越狱，使后继者的越狱之路难上加难。

永留史册的胜利大逃亡

1942年5月，日军占领金华、衢州，直逼上饶。国民党当局临时决定将第三战区南迁的时间提前，集中营也将随迁。在即将迁移的关键时刻，看守更加严密，卫兵也更加谨慎。对于迫切想要暴动的新四军将士来说，在这种情况下仓促行动，取胜的把握不大。就在此时，为了避免迁移途中带着伤病员影响行军速度，集中营临时决定在出发前处决一部分行动困难的病重伤员。6月5日凌晨，南迁队伍正式向福建转移，一路上，看似平静的队伍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波澜，第六中队秘密党支部的同志焦急地寻找暴动时机。一天深夜，正当大家熟睡的时候，一场灾难发生了，一群宪兵把沈韬、周圭麟等5位秘密党支部成员抓走，当晚就对他们严刑拷打，并将他们残忍地杀害。

必须赶快行动，否则会有更多的同志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。对于

第二天，车队将从红柳滩到达多玛兵站，全长335公里，这段最艰难的路程不仅路途远，而且还要穿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段公路——界山达坂，要想顺利穿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果然，车队刚刚出发，前方就出现了堵车的意外情况。

堵车，在人迹罕至的新藏线上极为少见，记者这次也算是开了眼界。原来，前方是有着因道路成连续性台阶状而得名的奇台达坂。前一天晚上，两辆大货车在达坂的拐弯处撞在了一起，但要想在短时间内把车修好、疏通道路，却不太可能。

汽车兵们着急了，纷纷跳下车来，经过一番测量，他们推断，道路仅剩的宽度不足3米，而我们的汽车宽2.5米，勉强可以通过。

车队小心翼翼地离开了堵车现场，并最终成功从狭窄的道路间穿过。但这时车上的战士们却又出现了意外情况：由于这段路的海拔高达5000米，使新兵们的高原反应更加明显，不少人出现了呕吐、流鼻血的状况，部队只能停车就地休息。

车队停车休息的地方叫泉水沟，可过往的司机们都习惯叫它“死人沟”。上世纪50年代，第一批进入阿里的某连队走到这里时，天色已晚，便在这里露营，却从此失去了音讯。直到几天后，另一个连队赶到这里时才发现，他们都已经冻成了雪人，官兵们全部牺牲。从此，这个可怕的地方被大家称为“死人沟”，而在后来修筑这段公路时，平均修1公里的路，就会倒下1名军人。

带着征服高原的决心，战士们终于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——阿里狮泉河。走过4天艰险的路程，对高原上的这批新兵来讲，只是一个开始，在这一刻，更为艰巨的任务已经落在了他们肩上，那就是为祖国、为人民站岗巡逻、保疆守土。

第六中队的成员来说，由于集体暴动人数众多，沿途卫兵看守严密，贸然行事必然会付出极大的代价。6月16日，大部队到达福建省崇安县，距离目的地只有两三天的行程了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秘密党支部终于决定在第二天举行暴动。

1942年6月17日，大部队行进到福建省赤石镇，横在大家面前的是崇洋溪河，对岸就是武夷山，纵深数里的山地，群峰高耸，地势复杂。此刻，一场惊天动地的搏斗就要在这里发生。按照要求，六个中队在特务、宪兵的押解下，依次坐船渡河，凡是过河的队伍都不等后续部队，继续前进，这样就造成了后面兵力的空虚，这恰恰给第六中队暴动创造了极佳的条件。先到达岸边的队员都在原地休息，等待最后一条船过河。

当载着最后一批人的船刚一靠岸，战士王达均立刻唱起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这是大家事先规定好的行动信号。一听到信号，暴动的队伍全都站了起来，这时，特务、宪兵根本没有意识到要发生什么。此时的新四军将士已不是被关押在牢笼里的困兽，在山崩地裂的号令声中，全体战士一拥而起，沿着预定的目标冲锋。脚下是崎岖不平的山路，耳边是呼啸而过的子弹，此刻，眼前处处是生存的希望，但也随时有死亡的危险。进入深山老林后，枪声渐渐停了，酝酿已久的集体暴动终于取得成功。

本文由央视《走遍中国》栏目提供